

范畴本体论视角下的日语语义研究与文化阐释

黑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

李贵鑫

[摘要] 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语言研究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范畴作为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本体论研究具有滞后性,导致部分语言现象难以得到充分解释。范畴本体论的提出,可以作为现有范畴理论的补充,为范畴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范畴本体论在语言与文化研究中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范畴不仅是语言形式的组织单位,亦是社会文化在语言中的外现。在范畴本体论视角下,结合日本社会文化语境,对日语语义范畴的构成方式及运行机制进行考察,并以亲属、内外等范畴为例,论证了范畴作为日本社会文化认知在语言中的具体呈现,为理解语义范畴与社会文化认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本体论视角。基于范畴本体论展开的语义分析,有助于深化语言现象背后文化认知机制的理解,并为语言、认知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方面提出新的思路。

[关键词] 日语语义 范畴 本体论 文化 数字人文

近年来诸多学者相继指出语言不应仅被认为是人类认识世界发挥交际功能的工具,更应被视作人类进行思维的物质载体。字、词等得以自由运用的最基本语言单位,承载着文化经验与认知结构的历史积淀。随着学界愈发关注语言中具体语言单位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相继提出历史文化语义学、认知文化语言学等研究路径(沈家煊,2017;冯天瑜,2023;文旭,2024;文旭,2025a、2025b;王向远,2025;吴菡,2025),亦有学者从文化对于语言习得影响的角度出发考察文化因素对二语加工的影响等问题(黄琳、卢梓棚、马利军,2023;崔希亮,2024;吴菡,2025)。在国外研究中,Lakoff(1973、1980)、Taylor(2003)、Geeraerts(2010)等系统揭示了范畴、原型与认知模型在语义解释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指出概念范畴的形成与运作并不完全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中呈现出差异化特征。日本相关研究在语义现象的细致描写与认知解释方面成果显著,但多集中于将范畴视作理解隐喻手段或理解文化的工具(桥本健一,2000;山梨正明,2013;石黒圭,2013),对范畴其本体结构特征及整体运行机制,尚缺乏系统讨论。

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有学者提出应在语言实践中展开对字、词的“知识考古”,通过历时与共

[收稿日期]2025-12-28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1年度黑龙江省博士后科研启动金“重大突发事件的新媒体通报类话语研究”(编号:LBH-Q21168)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李贵鑫,男,黑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话语研究、日本问题研究,电子邮箱:wkd-hh@163.com

时、跨文化与跨语言的比较,考察语言单位意义的生成、演变及差异,由字通词、由词通道,进而揭示语言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逻辑与人类思维方式。此类研究与当下学界关注的概念史研究及“词与物”研究形成了内在照应,两类研究范式均强调从具体语义入手,考察语言、经验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动态关系。语义不仅是词项指称关系的体现,更是不同文化群体世界观、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体现,其结构性差异深刻影响着该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认知方式与行动选择(冯天瑜,2023)。故在语义学中确定语义的本质特征对于准确描写、分析和解释语义不同种类的对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文旭、文雅兰,2025a:5)范畴作为语义被剥离出具体语言活动后抽象而成的概念集,更能够反映该语言共同体隐匿在语义背后的文化特质。研究一个词语的基本范畴在各种语言中不同的语义内容,可以揭示其产生和运用的文化特质,洞察赋予它意义的文化内涵(杨小洪,2007:31)。由语义结构与范畴特征切入,对具体语言单位进行文化语义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该语言本体的理解,也为语言与文化、认知之间的深层互动机制研究提供了有效路径。本文尝试提出范畴理论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在范畴本体论承诺的基础上对范畴进行更进一步研究,以发现文化如何内化为语言意义,又如何借助范畴体系反向塑造人们的认知方式与社会实践活动。范畴本体论不同于经典范畴理论强调本质特征与清晰边界,也不同于原型范畴理论关注人类认知方式与范畴家族相似性结构,范畴本体论更关注范畴在具体语言运作中的生成机制及存在形态。范畴本体论更关注范畴在具体语言运作中的生成机制及存在形态。本文以日语中典型语义现象为切入点,从范畴本体论视角出发,探讨范畴在具体语境中的生成、变化与调整,以及对社会文化的建构作用。

1 范畴工具论的局限性

范畴是联系“语言、人与世界”的桥梁,是人对世界认知的基本方式。范畴与人对世界的认知同构,是人对世界认知的具象体现。对范畴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语言、理解意义以及把握人类认知活动的基本方式。现代范畴理论主要分为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

1.1 经典范畴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对范畴以及范畴的本质进行了阐释。亚氏学说中范畴的本质可总结为“范畴内部各成员具有同样特征,该特征呈二元对立,范畴内各成员地位均相同,且范畴边界清晰”,该理论被称之为经典范畴理论。亚里士多德将范畴视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逻辑工具(吴世雄,2004:34-35)。通过经典范畴理论可以对一般性事物进行基础性认识,例如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对「椅子」这一范畴形成的基本认知,往往以是否具备“可供人坐靠”这一功能性特征为判定标准。凡具备该特征的物体即可被归入这一范畴,不具备者则被排除在外。在经典范畴语境下,根据既存的判定标准,对象要么属于该范畴,要么不属于该范畴,不会出现例外情况。范畴内各成员间处于同一地位,不存在差异,其范畴边界被理解为清晰而稳定的。

当同样的判定逻辑被应用于某些具体概念时,其解释力便显得不足。日语中的「兄弟」一词在实际使用中既可指“兄弟”,也可泛指“兄弟姐妹”。若按照经典范畴理论的思路,应当首先确立一个稳定的本质特征,但此时判断该范畴的标准究竟是“同辈男性家族成员”,还是“不区分性别的同辈家族成员”

存在一定困难。「姊妹」一词通常只指同辈女性同胞,较少用于泛指全体同辈家族成员。这种差异表明「兄弟」与「姊妹」并未在同一组固定特征下形成对称范畴。若以性别作为本质特征,则「兄弟」的泛指用法难以解释;若以血缘与辈分作为本质特征,则「姊妹」的指称范围应包含在「兄弟」这一范畴之内。「兄弟」并非静止地处于一个绝对稳定的范畴之中,而是呈现为一个在具体使用中不断被重新界定的范畴。其判定标准与范畴边界并不预先固定,而是会随社会关系结构与交际情境的变化而发生调整。这类范畴在语义运作中所表现出的关系依存性、情境敏感性与边界可变性,难以通过“是否具备某一固定特征”的二元判定方式加以说明,也在事实上削弱了经典范畴理论所预设的范畴边界清晰性与稳定性。

对经典范畴理论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经典范畴理论只考虑语言与世界的二元关系,范畴只存在在“是”与“否”的二元属性,否定语言模糊性的存在,也否定了客观世界的模糊属性。经典范畴理论的工具论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范畴内”与“范畴外”,使“人”“语言”与“世界”三者的联系被割裂,不能触及语言研究的本质内容,也不能全方位地研究、解释世界,致使某些研究成果不够全面,无法对哲学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很好地解答。

1.2 原型范畴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奠定了西方范畴研究的基本框架,其关于范畴划分方式的讨论长期影响着语言学与哲学领域。随着语言研究视角的转变,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范畴理论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反思。在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性”思想的启发下,学界逐渐开始关注范畴中的原型成员,并进一步形成原型范畴理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非完全客观,范畴内的成员并不具有同样特征,成员间关系依靠家族相似性的方式维持,并在若干特征维度上呈现出交叠式的相似关系,其特征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加以界定。原型范畴理论还强调范畴边界具有开放性与模糊性,范畴成员在典型性程度上存在差异(王寅,2007:100)。原型范畴理论认为的范畴特点与维特根斯坦等提出的“摹状簇理论”观点一致,该理论强调一个能指符号在指称某种性质时,并不是只能够指称一个摹状语,而表示一个由多个摹状语组成的“一簇摹状语”,这个“摹状语簇”对应范畴理论中一个范畴内拥有多个成员的基本特征。故一个指称所表示的“一簇摹状语”在语言学层面可视为一个范畴,该范畴具有原型理论规定的所有特征(李贵鑫,2021:120)。按照符号学的观点,范畴内摹状语簇的本质是一个能指符号对应多个指称对象。范畴内部摹状语簇成员间关系符合家族相似性特点,则该符号(指称)在语义层面便应具有模糊性。“符号(能指)与摹状语簇多个成员(所指)的非一一对应”是一种所有语言均具备的基本属性,是“语义模糊性为语言的自然属性”这一断言的基础(李贵鑫,2017:8)。原型范畴理论的提出解决了经典范畴理论中“二元世界”无法解释的现象,将人类的认知由二元世界演化为三元世界乃至多元世界。

原型范畴理论对于范畴功能性的过度重视导致对其本体特性的描写程度不足,从而对某些涉及范畴间语义关系和范畴内部成员关系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日语中的「内」与「外」常被用于标记交际双方如亲疏、组织集团归属与社会身份等人际关系。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可以认为“集团内部成员”是「内」的范畴原型,而陌生人是「外」的范畴原型,其余对象则根据家族相似性被置于社会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但在日本的实际交际场景中,「内/外」的范畴划分不能以某一固定范畴原型为参照进行,而是要随交际情境不断发生转换。同一对象A场景中可能具备「内」的属性而在B场景中却拥有了「外」的

属性。这种范畴边界的即时生成与切换,已经超出了原型范畴理论所设定的结构框架。原型范畴理论无法解释其作为关系性范畴的本体特征。原型范畴理论虽然以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为基础,但其工具论倾向忽视了对范畴本体特征的研究。原型范畴理论将重点放在人类识解世界的方法上,对于范畴本体的具体特征没有给出足够详细的解说,对于上述复杂的复合式范畴内部结构与逻辑关系不能进行很好地解释。

1.3 两种范畴理论的工具论局限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虽然在解释路径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语言工具论的立场,将范畴主要理解为服务于认知活动的工具。语言工具论的观点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对语言的定义为“语言是工具,是对来自原型、事物本身这一类东西的描摹、制作和判断”(伽达默尔,2004:528)。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语言是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并将其作为其理论系统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自己的逻辑学著作命名为《工具论》便清楚地展示了其语言工具论观点(江怡,2005:4)。在古典哲学传统中,语言始终被理解为服务于认知活动的工具,其意义在于帮助人类把握世界。语言工具论认为人类通过语言认知世界,语言是人认识世界的工具。同时,语言工具论还认为范畴化是人认识世界的方式,范畴化得到的范畴被认为是人识解世界、描写世界的方法与手段。语言、范畴与认知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的工具性关系:语言为认知服务,范畴是认知结果的语言化呈现。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主张的语言工具论观点影响了对范畴的理解。语言工具论注重语言的功能性,但忽略了语言的本质。针对语言本质提出工具论观点在其后的形而上学思想中一直都占据着统治性地位,以致伽达默尔等人甚至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研究已经放弃了语言,从而导致对语言本质研究深深陷入遮蔽状态之中(黄小洲,2010:30)。通过功能来对一个事物下判断,事物本体的存在便会被功能掩盖,对该事物本质的了解与认知便会受到阻碍。这是用功能来定义事物的重大缺陷(钱冠连,2001:3)。当语言仅被理解为达成认知目标的手段与工具时,其自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历史性与文化承载功能,往往被排除在理论视野之外。当语言被完全还原为认识世界的工具时,语言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意义系统,其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便难以得到充分说明。这一缺陷在具体语言事实中较为明显。从工具论立场出发,语言单位被理解为对客观事物或既定范畴的指称工具,则如日语中「兄弟」一词便难以得到合理解释。工具论认为「兄弟」与「兄」「弟」之间应当存在稳定的指称对应关系,但实际语言使用却表明,「兄弟」作为整体性名词,其语义功能并非简单地由下位词项累加而成。这类现象表明语言并不只是认知世界的工具,而是在自身结构中形成并维系着特定的意义组织方式。

1.4 范畴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对于范畴本体的工具论认识限制了范畴本体论研究的发展,对客观世界的连续性、模糊性、离散性、动态性、相似性、区别性等特点关注不足。范畴并非仅是对客观事物静态分类的工具,同时也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深度嵌入语言结构,积极参与人类对世界意义的建构概念。当语言在社会活动中的实际运用呈现出与既有范畴认知不完全契合的现象时,既有范畴理论的分类标准与认知机制,往往缺乏足够的解释力。某些语言单位在语义运作中具有整体性、层级性与文化依赖

性等特征,上述特征的存在导致现有范畴理论在解释反训词时,即一个范畴内同时存在两个对立义项的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日语中的「いいです」(好的、不必了)、「今度」(这次、最近、下次)等。现有范畴理论在解释这种一个范畴内包含两个对立义项的反训词时,既不能适用经典范畴的二元论方法,也无法轻易找出该范畴的范畴原型。反训词不仅日语中有,在其他语言中亦颇为常见,故可认为反训是一种语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对于语言普遍性特征缺乏解释力则表现出该理论尚存较大可修正空间,语言本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有范畴理论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现代语言学与哲学将“语言、人与世界”的三元关系作为研究基础,对语言的研究也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语言问题和本体论问题紧密联系,语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就必然涉及本体论问题,要把本体论问题讲清楚,则又须依靠考察语言来完成。要追问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还原该事物的本质属性。对于解释“是什么”的问题应从语言维度切入,要澄清不同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则要厘清语言概念间的关系(张庆熊,2008:55)。语言本体论承认语言为特殊的“是者/在者”则与语言相对应的范畴也应为特殊的“是者/在者”。这同索绪尔主张的结构主义指称观相一致,索绪尔的语言观中已经蕴涵了丰富的语言本体论思想(李洪儒,2010:23)。范畴可以认为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特征的特殊“是/在”,对于范畴的研究具备从工具论转向本体论的天然条件。

2 范畴本体论的提出

西方哲学家尤其是欧洲大陆哲学家将“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这一命题作为语言的定义,降低了语言的重要地位,与欧洲大陆哲学本质观念相悖。不摆脱语言工具性认知的窠臼,就不能认为真正触及到了语言的终极本质。不关注语言的非工具性方面,就会偏离追寻语言的本相的方向(钱冠连,2001:2-6)。本体论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是把语言或最小词汇单位当做世界的主体,而是应当关注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关联性。这种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借助语言来研究。(张庆熊,2008:58)

范畴作为连接语言与世界的重要环节,对其本体论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从本体论出发研究范畴就是研究人与世界。关于范畴本质研究,在对亚里士多德、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等人学术思想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范畴的本质是范畴成员及这些范畴成员间的结构性组成”的观点(陈维振,2001:59)。语言和世界的相关性使得我们发现,我们了解语言就是了解世界。语言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结构非常精密,不对语言进行进一步的解构,对于世界的研究便无从谈起。语言系统本体论研究是研究世界的“是/在”。根据原型范畴理论可知一个范畴内各个成员间不具有唯一共同特征,但各成员相互联系。如果我们将“是/在”当做一个范畴,其内部应包括我们认知的整个世界与未知世界,即“是/在”是“最大范畴”。“最大范畴”内部各成员相互联系,我们整个世界是由“是/在”指称的一个相联系的整体。范畴对世界的反映并非为世界重新制定秩序,而是一个发现已有秩序的过程。我们对世界产生不同认知的原因是我们从不同角度对世界进行识解,就好像将一个蜂巢从不同角度切割,得到不同的横切面,范畴的不同横切面不但展示了范畴中不同的范畴成员,还展示出不同范畴成员间的关系,范畴内部各成员间的结构关系不会因为不同角度的切入发生变化。

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迫使语言学家运用哲学眼光去观察审视语言本体问题。哲学率先把语言视

作研究本体, 语言学就须将语言当做本体之本体、核心之核心。语言研究须从语言本体观出发建立与发展语言学相关理论(潘文国, 2008: 20)。本文所使用的范畴本体论并非对既有范畴理论的简单否定或全新体系建构, 而是在语言本体论与既有范畴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分析视角, 旨在强调范畴作为语言中具有结构性与持续运作特征的存在形态, 并使相关概念在语言学分析中具备可操作性。我们所说的基于“语言本体观”的范畴本体论研究指的是如果有符号X指称一个范畴A, 我们对范畴A进行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X包括什么内容”“X的意义是什么”“物体c是否属于范畴A”“什么样的物体属于范畴A”“范畴A中最典型的成员应该是什么”等问题, 而是研究“范畴A是一个具有何种特性的特殊‘是/在’”“范畴A内部是何种结构”“范畴A内各次范畴(成员)间的位置、关系如何”等问题。基于以上观点, 在结合语义场理论、原型范畴理论、结构主义语言观及认知拓扑理论等研究基础上, 从范畴本体特征层面对既有理论进行综合提炼, 认为范畴本体至少具有整体性、立体性、层级性、拓扑性、动态性、模糊性等特征。通过建立基本范畴观, 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分析语义生成特征以及语义发展与社会文化演进间的关系, 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支撑。

2.1 范畴的整体性特征

范畴的整体性特征是基于语义场理论提出的。语义场理论认为在同一种语言中, 部分语言单位会受到共同概念的统摄形成相互关联的语义系统。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语言单位在意义上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通过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整体。对某一语言单位语义的理解, 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 同时应结合其与同一语义场中其他语言单位之间的语义关系, 以及该语言单位在语义场内部所占据的具体位置加以考察(文旭, 1995: 28)。语义场理论认为一个语义场中一个语言单位同其他所有语言单位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语义联系, 语义场内所有语言单位形成一个整体系统, 该语义场内部在不断发生变化。如果一个语言单位的语义扩大, 则其旁边语言单位的语义就会相应缩小, 甚至可能会影响该语义场内部整体结构。

一种语言可视作一个相关联的整体, 其内部不仅语音、语词、句法和语义等部分之间互相关联, 各部分内部的成分也互相关联(陈波, 2014: 141)。由于语言与范畴的同构关系, 我们可以认为语言的整体性就是范畴的整体性。范畴的整体性保证了我们可以通过与对象符号相关的其他符号的意义理解对象符号, 也保证了语言共同体中不同个体对同一符号理解的差别能够被限制在不影响不同个体间相互交流的程度。个体的范畴获得是在兼顾具体话语场景、语用交际目的、个体认知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的。个体对于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化的结果具有特殊性与临时性, 由社会个体通过范畴化后产生的临时性结果不足以影响社会层面的范畴结构。但大量个体在相近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形成的范畴化结果相叠加便会孕育出社会层面的一般性范畴化结果, 即形成一个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范畴。这一过程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精确界定的数量阈值, 如果对“无数个是多少个一个”进行追问, 则我们又将陷入无尽的悖论之中。从范畴本体论的角度结合语义场理论可认为“一个语词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其他意义不同的语词一起组成一个相互联系网络”(桥本, 2000: 58)。根据语言哲学的基本概念我们认为语言与世界同构, “是/在”是一个“最大范畴”, “最大范畴”内部包含所有语言符号也包括所有客观世界。“最大范畴”是一个“最大语义场”, “最大语义场”内包含所有语言单位并反映全部世界。

日本文化中的「内」与「外」意识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即便二者在不同的语境

下其所对应的范畴与对象都不断变化,但根据范畴的整体性特征,无论在何语境下交际双方对于「内」与「外」的认知都可以通过话语活动澄清。对于某一对象的「内」与「外」的区分均具有排他性特征,即话语活动涉及的对象要么属于「内」要么属于「外」,不会在同一场景下同时属于「内」与「外」双方。日本文化中的「内」与「外」并非以孤立词项的形式存在,而是嵌入于一个由结构性社会关系、主体身份认知与即时交际立场共同构成的文化语义网络之中。在具体语境中,「内」与「外」的判定并不依赖于对象自身的固定属性,而是依靠说话人在整体关系结构中对交际各方位的认知。同一对象在不同语境下可能被归入不同范畴,但在单一话语场景中,其范畴归属却始终保持明确。交际双方往往通过上下文语境、交际场合与社会文化常识,对相关对象的范畴位置进行即时确认。一旦这种确认在交际过程中达成,「内」与「外」的界限便在该语境中暂时稳定下来,从而保证交际顺利进行。这种稳定性并非来自范畴自身的属性本质,而是由于范畴处于整体语义系统下达成的暂时平衡。

2.2 范畴的立体性特征

原型范畴理论指出范畴内的每个成员不具有相同的地位,其中核心成员占据中心位置,其他成员围绕该核心成员进行分布,成员间通过家族相似性建立联系。但该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范畴内部成员间的单一维度关系,对于不同成员间的多维度关系并未进行深入探讨(李贵鑫,2021:123)。语言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交流工具,其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只能通过线性序列来展现无限的多维概念空间,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真现象的产生(沈家煊,1993:1)。对范畴内部成员间单一维度关系的研究无疑可以解决某些特定的语言问题,但范畴内部成员间多维度关系研究的缺乏导致现有范畴理论在试图解释一些如日语中「兄弟」具有可以同时指称“兄弟姐妹”的现象时显得力不从心。

范畴成员可以视为该范畴的次级范畴,而次级范畴内部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小的层级,即次次级范畴或次次次级范畴。具体选择将范畴划分到哪一层次,取决于交际活动中所需信息的质与量。在现有范畴研究中多关注范畴内部个体成员,主要将研究延伸至次级范畴层次。许多研究并未深入探讨基于具体的交际或认知需求,将范畴进一步细化到次次范畴或更小的单位。当我们将范畴细分为次级或次次级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原对于解决词汇语义、社会文化结构以及语言哲学等领域的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语言结构是人类与周围世界互动的产物,即人类认知的结果,语言的空间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结构(文旭、匡芳涛,2004:82)。由于世界、语言、认知、范畴的同构关系,从范畴本体论的角度尝试提出范畴内部具有空间特性,即具有立体性的结构特点。将范畴的研究视角从平面的二维空间转移至立体的三维空间,认为范畴内部的各个次范畴在该范畴内部组成一个立体的空间。可以将范畴比喻成一个蜂巢,对于范畴不同角度的研究就是从不同角度将该蜂巢切开,呈现在面前的是立体蜂巢的横切面,从不同角度切开的蜂巢,获得的横切面均不相同。横切面内一个个小蜂窝就是范畴内部的一个个次范畴,这些次范畴在本层级可视作单一范畴成员,显示为简单结构范畴。如将该简单结构范畴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分解则其内部同样具有蜂巢的结构特点,内部具有一个个次次范畴。同理,每一个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范畴其内部具有无数次范畴与次次范畴,其本身也作为其他范畴的次范畴或次次范畴存在。语言范畴的无限性同客观世界的无限性相统一,再次证明了语言与世界同构。一个范畴同时与无数个范畴相联系,与该范畴相联系的各范畴之间,有的直接关联,有的不直接关联,体现了客观世界的多样

性与未知性。范畴的立体性特征展示了范畴内部成员三维立体的关系结构,不同研究角度得到不同的范畴内部成员关系特征。前文通过分析指称亲属关系的「兄弟」一词表明,范畴的成立并不依赖单一标准,而是基于其整体性特征,由多个维度在具体语境中的共同作用形成。作为表示个体社会性评价的「先生」一词同样在多重关系维度的交互中形成其范畴特征。「先生」一词在日语中多用于对老师、政治家、律师、音乐家、医生、画家等职业身份的指称,也可以泛指某一领域的“权威”或长者。原型范畴理论以“教师”为原型范畴,试图解释「先生」的具体语义特征时,容易遇到以下问题:一方面,医生、议员等与老师在职业属性和社会功能上相距甚远,难以通过“家族相似性”合理解释;另一方面,对于音乐家、画家等职业的指称,也并非基于社会权威或指导性关系,而更多体现出日本文化中“敬人之业”的认知模式。通过范畴本体论可将「先生」视作一个由“身份—职业—关系—文化”认知四维坐标构成的空间范畴。在不同维度中「先生」一词所指称的具体对象虽不同,但其内部包含多个彼此独立却互通的次范畴。这些次范畴在立体结构中如蜂巢的不同腔室,对「先生」从不同维度切入可以获得若干不同的横切面,从而呈现其多层次的立体范畴特征。这些横切面分别揭示了「先生」在日本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不同功能与意义取向,并由此勾勒出教师、政治家、律师、音乐家、医生、画家等不同职业在社会认知中的地位与价值序列。语言范畴不仅承担指称功能,同时也深度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之中。通过不同语境下的多重横切面,「先生」被识解为一种具有高度社会评价意义的关系性范畴,并由「先生」的范畴结构特征反映出日本社会对知识、权威与专业性的结构化理解,这一过程表明语言范畴在社会意义的生成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3 范畴的层级性特征

无论是经典范畴理论还是原型范畴理论均承认存在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其在范畴中对应上位范畴与下位范畴。对范畴层级的区分体现了世界的存在形式是由抽象到具象,越是靠近下位区域其表征内容就会越具象,反之靠近上位区域的其表征内容就越抽象。表征的内容越抽象其指称对象的辐射范围越广,其内部所包含的成员也更多。范围更广、成员更多的上位范畴相对下位范畴会表现出更多的抽象性,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多体现为语义的模糊性。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不是最上位范畴也不是最下位范畴,而是基本范畴。基本范畴具有最容易被认知的特性,既不过于抽象也不太具体,与日常生活距离最近。

原型范畴理论虽然承认了范畴间的层级性差异,但忽略了关于范畴本体层级性的进一步解说。我们认为对于范畴仅用“家族性相似性”难以充分说明。范畴内部的层级关系像是一个蜂巢内部具有的立体结构,抽象范畴包含具体范畴,认知度最高的基本范畴处于蜂巢的中间层。原型范畴理论中的层级性指在一个平面中,一个范畴内部各成员根据同范畴原型的远近来区分范畴成员的典型性,是在二维的空间内对范畴内部成员关系的描写。本文说的层级性指范畴内部不同次范畴间的立体关系,是在三维的空间内对不同范畴结构关系的描写。范畴层级性特点是一个上位范畴可以具有不同维度的多个次范畴,上位范畴与次范畴之间呈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大蜂巢内部包含的蜂窝,或者蜂窝内部包含的次一级蜂窝。范畴内部立体空间不同维度的再范畴化的结果可体现为不同的次范畴,不同次范畴在语言层面表现为指称意义与陈述意义,两个意义具有内部立体的关联性。如日语中的授受表达除了表现社会个体之间物或非物的移动外,还具有凸显说话人的主观态度的功能,具有极强的文

化特征,是日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日语中表示人际授受关系的动词「あげる・くれる・もらう」,从范畴本体论视角看,这三者并非处于同一平面,而是对应着同一上位范畴在不同维度上的切分结果:

- 一个维度是视点(谁是参照中心)
- 一个维度是关系方向(内 / 外)
- 一个维度是主体间性(施动/受动)

从语言表现形式上看,授受动词的不同层级范畴同时体现在:

- 指称意义:建构人际关系、谁给谁、谁得到什么。
- 陈述意义:如何评价这一事件、如何定位自身与他人的关系。

日语授受动词体系清楚地展示了范畴的层级性并非仅存在于抽象概念与具体概念之间的线性关系中,而是一种具有多维度、可嵌套的多层级结构。不同授受动词的选择,体现了说话人对话语发生场景人际关系的认知,起到了建构交际活动参与者间互相关系的作用。

2.4 范畴的动态性特征

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所有语词之间均存在联系,且这种联系并非静止不变,它们一直在缓慢地、持续地发生变化。世界不停地发生变化,不停有新事物产生也不停有旧事物消灭。一种语言不停地有新词汇产生也不停地有旧词汇消失。每种语言的基本单位都表征特定的事物或概念,这些事物或概念通过语言形成一个更加复杂和庞大的有机系统,这个系统在不断地经历缓慢且持续的变化。范畴是这些相互关联并不断变化的事物按照不同标准划分的结果。客观世界本身的不断演变,让范畴的划分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性和临时性。针对这一特性索绪尔提出了语言的历时与共时二元语言观。从共时角度看,范畴被视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分类结果;从历时角度看,所有的范畴都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结构主义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也将范畴的一般性特征与临时性特征凸显出来。

无论共时语言与历时语言,还是语言与言语的划分都是基于语言本体论提出的,作为语言本体中存在的范畴本体自然具有语言具有的诸特性。范畴理论将经由范畴化处理且具备模糊性和临时性的划分结果称为范畴。范畴中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动态结构。该内部结构复杂到无法精确重现每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具体关系,只能大致把握某一成员在范畴中的位置。世间万物的存在表现出一种稳定与变化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在微观层面上体现为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在宏观层面则呈现出缓慢变化的趋势。我们在研究具体范畴时认为该范畴现在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承认范畴的相对稳定状态并非否定其正在缓慢变化。在研究范畴时,其变化的程度与速度不足以影响最后研究的结果。随着世界的高速发展,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个范畴的意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只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的范畴在多数时间内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我们不能抛开动态性,只考虑其相对稳定的状态,也不能过分考虑其动态性特点,过分地考虑动态性特点便无法对任何一个范畴进行研究。

在日本社会生活中,同为指称亲属关系的「嫁」(妻子)其重要性要远远高于家族内的「兄弟」范畴。究其原因日本社会对于「嫁」与「兄弟」的认知受到其上位范畴「家」的影响。「家」这一范畴是日本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可将其视作一个结构性集团。「家」在日本社会中一般是由“家成员”构成,“家成员”的资格主要通过是否共同生活或生产来判断,其内部成员身份可以发生变化。「嫁」是从外部集团迁移进来的“家成员”,具有极高的稳定性。而「兄弟」一旦成婚,便认为是已经脱离原有「家」范围,独立形成新的生活集团(中根,1967:33-35)。「嫁」通过婚姻发生了身份转变而进入「家」,「嫁」被重新范畴化为“家成员”,其与原有集团的联系在社会实践与语言表述中被切断。「嫁」作为从外部迁入的“家成员”,其进入新「家」后其角色与身份一般呈现长期且稳定的状态。可以说「嫁」在「家」的动态结构中承担着维系结构稳定与保证成员延续的功能。「兄弟」在某一阶段处于「家」范畴的核心位置,但这一范畴特征本身具有明显的临时性。随着出嫁、分家、入赘等家庭成员身份转换,「兄弟」(特别是女性成员)往往被重新划分为另一个「家」的成员,其原有的范畴身份随之消解。这种从一个「家」的范畴向另一个「家」的范畴的移动,体现了「兄弟」在动态结构中较高动态性。故「兄弟」在原有「家」范畴中更多体现在暂时性的功能层面,而非结构性稳定层面。「嫁」与「兄弟」分别承担着长期稳定与短期可变的不同功能角色。正是这种角色差异使得二者在指称亲属关系与文化认知建构中呈现出不对称的重要性。通过动态范畴观对「嫁」与「兄弟」两个同位范畴的考察可知「家」这一概念并非通过静态成员数量来维持自身结构稳定,而是通过对成员流动的制度化安排来保持结构连续性与稳定性。「家」这一范畴充分体现了范畴的动态性特征,其内部成员的动态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日本社会“家族人际关系”的整体平衡,进而形成较为稳定的家族式社会结构。

2.5 范畴的拓扑性特征

拓扑学的观点认为,那些能够相互变形的形状被视为“拓扑”图形,即同胚图形。在经过同胚映射后仍保持不变的性质被称为拓扑不变量或拓扑等价,是最为常见的拓扑特征(文旭,2017:2)。原型范畴理论中家族相似性的特征使各成员间产生相互联系,不同的划分方式或划分维度,各成员之间的联系形式不会发生改变,这是范畴拓扑性的体现。范畴的拓扑特性从侧面印证了范畴的整体性与立体性。拓扑连通性是语言拓扑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同一语言拓扑空间中的元素之间彼此是相连的,存在一条或多条心理路径将两个元素联系在一起(文旭,2017:5)。范畴化是在具有立体结构且具有整体性的原始范畴上进行的,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范畴化不会改变各次范畴之间的结构关系。

日语中指称人际关系的「内/外」范畴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清晰例证。在不同交际语境中,具体对象的「内/外」范畴所属不断发生变化,但「内/外」范畴所对应的“归属/非归属”关系结构始终保持稳定。对象在空间或心理上的移动并未破坏范畴内部的对立关系与排他性特征,这表明「内/外」范畴在多语境变换中保证了拓扑稳定性。「家」这一文化核心范畴亦表现出显著的拓扑稳定性。尽管家庭成员在不断流动,但「家」所维系的内部—外部、继承—延续等基本关系结构并未因成员的流动而被破坏。“家成员”的加入或退出近似于拓扑空间中的连续变形,不会导致结构断裂或消亡。范畴的拓扑性可以从结构层面解释语言意义在不同语境变化中的稳定性,为个体的范畴化结果向普遍一般性范畴化结果演进提供了必要条件。不同范畴化结果只会改变范畴的表层表征,并不改变其内部成员结构与同其他范畴间的结构关系,这也保证了社会普遍认知的结构性稳定。范畴的拓扑性观点不仅为范畴的整体性

与立体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也可解释语言、认知与文化在同一拓扑空间中协同运作的机制。

2.6 范畴的模糊性特征

模糊性作为语言的属性,在范畴的本体论维度同样存在。范畴的模糊性包括两种情况:一、范畴的边界模糊,范畴内存在具有典型特征的成员,成员彼此间依靠家族相似性相关联。在范畴边缘附近的成员是范畴典型特征最不明显的成员,很难确定其是否属于该范畴;二、由于个体认知的差异,语言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对于同一概念原型范畴的认知不会完全一致,这种非一致性使原型范畴理论中的范畴原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词与其他符号的另一显著不同是其作为能指的语音物质与作为所指的意义内容(兼指其内涵与外延)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华劭,2005:34)范畴的模糊性问题究其本质可以分为范畴的边界模糊与范畴的原型模糊。范畴的模糊性为范畴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的存在提供了保证。范畴边界模糊性保证了每个范畴与相邻范畴间的联系,使我们不能将“最大范畴”内的次范畴看作完全断裂的个体,这种联系体现为范畴的整体性;范畴原型的模糊保证了范畴的划分存在可变性,让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划分出不同的范畴,这种可变性体现为范畴的动态性。不管是边界模糊还是原型模糊,这两种特征均不会在由“是/在”指称的“最大范畴”上体现。我们无法指出“是/在”指称的“最大范畴”的边界在哪里,也无法指出“是/在”指称的“最大范畴”的原型是什么。

“最大范畴”内部的所有范畴均具有范畴边界模糊与范畴原型模糊的特征,但这两种特征有时候不会在语言中凸显。日语中的「内」与「外」之间的边界并不存在一个可穷尽的判定标准,是范畴模糊性的典型体现。这种模糊性并未导致范畴功能的失效,反而保证了「内/外」范畴在更大语言系统中的连通性。若「内/外」具有清晰且不可变的边界,则该范畴将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边界的模糊性,「内/外」才能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结构中反复被调用,从而作为一个稳定的关系范畴嵌入“最大范畴”之中,成为支撑日本社会文化的核心部分之一。

3 范畴本体论对范畴理论的补充

我们对范畴的研究一直围绕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展开。原型范畴理论出现后,经典范畴理论成为其主要批判对象,有些学者认为原型范畴理论是对经典范畴理论等全面否定,二者相互对立,只能取其一。

3.1 两种理论的长期争论及其局限性

在对经典范畴理论几乎全面否定后,近年来开始出现对原型范畴理论的批判以及对经典范畴理论的再认识,围绕两种理论的争论持续至今。俞建梁等(2008)、赵彦春(2010)、江桂英(2011)、杨梅(2017)等从不同角度对原型范畴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指出原型范畴对于一些语言现象的解释力、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等方面具有缺陷。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均尝试对范畴进行模型构建,但对于范畴的工具论认识限制了它们对范畴整体性的把握。

经典范畴理论对范畴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描述,而原型范畴理论则是从宏观的角度对范畴模型进行构建。两种理论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正误之分,这也正是范畴模型构建争论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

一。经典范畴理论中对于范畴描述的二元对立是认知世界的必须途径,若完全否定经典范畴理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将永远处在混沌之中。亚里士多德并未否认范畴模糊现象和范畴原型特征的普遍存在,并曾经做出了相当清晰的理论性描述(池舒文等,2017:21),经典范畴理论在人类生活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原型范畴理论充分考虑了模糊性的存在,较经典范畴理论更深入地对范畴内部特征进行描写,但其在否定世界本质存在的同时否定了客观世界一定范围内的抽象性特征,否认动态性范畴内成员所具有的共同属性是其受到批评最多的地方之一。

3.2 范畴本体论视角下的理论整合

从本体论视角重新审视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可以发现二者并非天然对立。如果我们认为整个外部世界是一个“最大范畴”,那么这个表示外部世界的“最大范畴”内部结构特点是符合原型范畴理论描写的,即客观外部世界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家族相似性。理论上,以任一存在A为起点,都可以借助家族相似性不断建立其与其他存在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覆盖整个“最大范畴”的联系网络,这正体现了范畴的整体性。外部世界范畴好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内部有无数个次范畴与次次范畴存在,次范畴与次次范畴的内部同样具有蜂巢结构,从不同角度对蜂巢进行切割得到内部范畴的结构关系不同,这体现了范畴的动态性特点。对于次范畴是适用经典范畴理论还是原型范畴理论要看范畴化是在微观层面进行还是在宏观层面进行,两种理论解释的是分处不同层面的问题。例如,在日语中考察「兄弟」与「家」两个范畴的关系时,若从经典范畴理论出发,在微观层面判断「兄弟」是否属于「家」,其结论是明确的。但若从范畴本体视角考察二者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区分其所处的范畴层级。「家」作为上位范畴,内部包含「夫妻」「親子」「兄弟」等多个次范畴,而「兄弟」仅是其中之一。「兄弟」与「夫妻」成为同一结构内部位置不同的次范畴,其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立体性与拓扑性特征。如果从「内/外」这一社会关系维度切入,「兄弟」在未婚状态下通常被视为「内」,而成婚后则可能新的家庭结构中被重新范畴化为「外」,这一过程并未改变范畴间原有的结构关系,而是体现了范畴的动态性与整体性。

3.3 范畴本体论转向的必要性

我们承认范畴模糊性的重要性,但也不能否定二元论存在的价值。对于一个范畴C的研究应使用经典范畴理论还是原型范畴理论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维度,即对于范畴C这一立体性结构切入的角度。不同的切入角度,我们得到横切面不同的范畴C'。原型范畴强调内部成员的家族相似性,认为范畴模糊性体现在范畴原型与范畴边界两方面,但拓扑性仍然发挥作用。范畴的拓扑性要求个体范畴化结果不会改变各范畴间的关系,每个人范畴化后得到的范畴C'其原型与范畴边界可能不同,但各范畴成员间原有的位置关系不会发生大的改变。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对应着不同层面的范畴认识方式。理论层面的差异最终会体现为范畴化方式的不同,即研究者在面对具体语言事实时,将依据不同的认知目的和研究维度采用不同的范畴化策略。因此,对范畴理论的讨论有必要进一步落实到范畴化过程本身。

范畴化的方式可以分为经典式和原型式两种。经典式范畴化基于经典范畴理论,适用于可以通过二元标准快速完成判断的情形;原型式范畴化则基于原型范畴理论,其范畴化过程更为复杂,也更符合实际语言使用中的认知特点。范畴化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交际目的与认知需求。在语言经济性

原则的制约下,经典式范畴化在某些场合往往会被优先采用。无论是经典范畴理论还是原型范畴理论,都不应被简单否定。通过对范畴整体性、立体性、层级性、动态性、拓扑性与模糊性的系统考察可以发现两种范畴化方式虽然能够满足不同层面的认知需求,却并未突破现有范畴理论对于范畴本体的理解。仅在范畴化方式层面对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进行协调,并不足以解决现有理论存在的根本问题。范畴本体论研究的缺失,使得现有范畴理论难以形成一个完整而连贯的解释框架。通过范畴本体论维度的引入,有助于对既有范畴理论进行补充与修正。

4 日语语义范畴的本体结构及其文化建构功能

范畴本体论认为在一个语言共同体中看似分散的语言事实在深层结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无论是亲属关系指称范畴与社会关系指称范畴,还是基于此产生的社会评价功能范畴,这些语言单位所呈现出的语义特征,同社会文化具有同质性。这些语义特征可以通过范畴本体论维度切入,可以将分析过程视为对该社会文化结构的还原。从语义或语用层面进行分析,只能发现语言表层的变化,难以触及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认知机制,也难以进一步说明语言形式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日语作为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语言现象同文化特质间的关系较低语境文化语言更加隐蔽,从范畴本体论维度对日语相关语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便更有价值与意义。

日语中「兄弟」一词可以指称包含姐妹在内的同辈亲属,这一现象从经典范畴理论出发,容易被视为指称问题或范畴混同;从原型范畴理论视角,虽可归为范畴边界的模糊性问题,但对“该现象在亲属称谓体系中具有稳定性”这一问题缺乏解释力。从范畴本体论视角看,「兄弟」并非以性别或血缘差异为标准,而是通过“同辈关系”这一结构性身份为范畴成员赋值。通过对这一范畴的熟练使用与理解,可以巩固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文化中「家」这一社会概念的认知。「家」这一概念成员在结构中的相对位置的重要地位,建构一种重视结构地位而非个体属性本身的文化特质,塑造出日本社会以关系结构而非个体差异为中心的文化取向。「家」以及「内/外」是日本社会中极具文化标识性的范畴。「家」以及「内/外」并非静态范畴集合,而是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结构单元。「嫁」可以作为外部成员通过身份变换进入「家」这一范畴,而「兄弟」在成婚后则可能脱离原有「家」的范畴,这种成员的可移动性并未为「家」范畴的整体结构产生影响,反而成为其稳定运作的基础。「内/外」的边界始终处于可调整的动态过程并不会导致认知混乱,反而保证了在日本社会中极为重要的「内/外」关系在不同话语场景中的灵活运用,揭示了日本文化中通过范畴动态性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基本方式。日语中的反训词同样体现了范畴本体论对于语义现象的解释优势。以「いいです」为例,该词既可表示许可,也可表示婉拒;「今度」既可表示上一次,也可表示这次或下一次。传统语义分析通常将此类现象归结为多义现象或需要依赖语境解释,经典范畴理论难以解释一个范畴中同时存在两个相反的义项;原型范畴理论虽然承认范畴内部成员间关系差异性存在,但对于反训义项如何确定范畴原型这一问题,仍缺乏进一步说明。从范畴本体论视角来看,「いいです」所对应的并非“接受”或“拒绝”两个独立范畴,而是“对当前交际行为的回应”这一更高层级的范畴;「今度」也并非单纯表示过去或未来,而是围绕“当前时间节点”所形成的时间关系范畴。不同义项在同一范畴内呈现一种立体性结构,并通过不同语境信息激活,是动态范畴化后的结果,且其内部结构关系始终保持稳定。这种以关系为中心、依赖交际情境完成意义确定的表达方

式,也反映出日本高语境文化强调共享背景、弱化词义绝对对应关系的语言特征。

一种语言中的语义特征并非孤立存在,是嵌入在具有整体性、立体性与动态性的社会范畴结构之中。范畴本体论视角使得语义分析不再仅仅停留在“语言使用方法”层面,进一步揭示了“语言指涉的世界是如何被组织和理解的”这一根本性问题。范畴本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日语语义结构的理解,也为从语言出发探讨日本文化的认知方式、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提供了更为稳固的理论基础。

5 讨 论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语言研究核心问题从“语言是否能够计算”,转向“语言作为计算的对象是否能够被恰当地界定”。当大模型直接面对未经充分论证的语言单位时,只能获得形式上精细、解释上薄弱的数据结果。范畴本体论的意义正在于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中介性的理论框架,使语言研究能够在解释与计算之间建立更为稳固的连接。

范畴本体论没有放弃现有的研究方法与计算工具,而是强调在进行语言处理之前对语言对象的范畴结构进行本体论澄清。语义单位并非简单的特征集合,而是特定范畴网络中的重要结构节点,其意义源于同其他节点的关系位置。这一观点对于语义计算尤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语义的可计算性并不依赖于普遍性意义同具体语境的剥离,可以从对范畴结构的处理与计算出发。在语言情感计算研究中这一观点的作用将更加明显。现有语言情感计算研究多倾向于将情感视为可直接标注的单位,但情感往往并非源于单一词项,而是通过范畴关系与社会认知逐层显现。如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关系范畴、以社会互动与评价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范畴,在具体语用中均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其本身就承载着情感取向与社会意识形态。情感并非一个独立维度,而是嵌入在范畴层级与拓扑结构中的关系性结果。这一认识为情感计算提供了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建模思路,即通过刻画范畴内部结构与成员位置差异,间接实现对情感强度与方向的量化计算。

在文化的量化研究中,范畴本体论同样具有基础性意义。文化特征不是通过显性标记凸显,而是通过范畴边界的设置方式、成员间的关系变化以及范畴间层级组织逻辑得以显现。日本文化中对「家」以及「内/外」的认识特征均表明文化并非一个可以直接定义的变量,而是一种通过语言范畴结构持续生成且不断变化的认知结果。文化的量化计算并不是将文化转化为可计算的数值,是通过对范畴结构稳定性与变化趋势的统计分析,还原文化在语言认知中的运行机制。范畴本体论还可为跨语言、跨文化的计量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可比性基础。以语言形式或词频分布作为跨语言的比较对象,其差异性往往难以解释。通过范畴结构进行深层对齐,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比较不同语言对世界认知差异。这种比较打破了研究对象被局限在语言单位层面的桎梏,将比较建立在范畴组织原则的对应关系之上,一定意义上避免了简单对齐带来的解释偏差。

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当下,范畴本体论作为一个“回归哲学”的理论思考,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语言研究基础理论,为计量语言学提供的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拓展,更是一种维持语言可计算的同时,兼顾语言与文化复杂性的研究范式。通过将范畴建构为具有本体地位的结构性存在,语言研究得以在数量与意义之间更平衡地展开。范畴本体论可为语义、情感与文化等复杂语言现象的计算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撑。

6 结 语

随着社会发展与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范畴作为语言学、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应突破范畴认知的工具论局限。基于范畴本体论提出的范畴整体性、立体性、层级性、拓扑性、动态性、模糊性等特征,对单纯将范畴视为认知工具的研究视角进行反思性拓展,尝试将其重新理解为具有整体结构与内在关系的存在形态。对范畴的认知从“认知世界的主要工具”转向“语言、认知与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所生成并持续运作的结构性存在”。这一发现有助于深化对语义结构的理解,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日语中一些长期被视为“特殊”或“例外”的语言现象提供了结构化的可分析路径,使研究从具体语言现象描写转向深层次的语言内部结构,并进一步延伸至社会情感、社会文化等意识形态层面。范畴本体论的提出为语义、情感与文化等复杂现象的量化研究提供具有可行性的理论支撑,为跨语言、跨文化的语义研究提供可对接的理论前提。在当代语言学不断向数据化、模型化方向发展的背景下,范畴本体论所强调的范畴结构多样性特征,有助于在定量分析之前明确研究对象的理论边界,可以提升语言研究在解释复杂现象时的可靠性与一致性。范畴本体论并非是对既有研究路径的否定,而是一种在理论与方法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范畴本体论的提出旨在为语义研究、文化语言学研究以及数字人文背景下的语言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 王向远.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东方语文学”诸形态[J].东疆学刊,2025,42(2).
-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 文旭,文雅兰.语义的本质特征:语义背后的深层逻辑[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5a(5).
- 文旭,匡芳涛.语言空间系统的认知阐释[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3).
- 文旭,赵耿林.认知拓扑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新趋势[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 文旭.从语义场理论看语言的模糊性[J].外语学刊,1995(1).
- 文旭.文化认知语言学再探[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25b(3).
- 文旭.文化认知语言学初探[J].外国语文,2024,40(5).
- 冯天瑜.从训诂到历史文化语义学[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76(2).
-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亚里士多德,方书春译.范畴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华邵.语言经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江怡.英美分析哲学(上),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八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 江桂英.原型范畴理论缺陷再议[J].厦门大学学报,2011(6).
- 池舒文,陈维振.被误读的亚里士多德范畴论[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7(2).
- 李贵鑫.语义模糊性问题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21.
- 李贵鑫.语义模糊性相关概念对比分析[J].外语学刊,2017(5).
- 李洪儒.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语言主观意义论题的提出[J].外语学刊,2010(6).
- 李瑛,文旭.从“头”认知——转喻、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J].外语教学,2006(3).
- 杨小洪.“鼻”语汇的文化语境与文化赋值[J].外国语,2007(5).
- 杨梅.再论雷考夫范畴化理论的缺陷[J].外语学刊,2017(1).
- 吴世雄,陈维振.范畴理论的发展及其对认知语言学的贡献[J].外国语,2004(4).

- 吴茜.具身认知与文化图式:中意习语语义的比较研究——兼论“差序格局”与“团契家族”的语言映射[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5(5).
- 沈家煊.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J].中国社会科学,2017(7).
- 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
- 张庆熊.本体论研究的语言转向——以分析哲学为进路[J].复旦学报,2008(4).
- 陈波.语言和社会意义的建构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
- 陈维振.从现象学的角度反思范畴和语义模糊性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
- 赵彦春.隐喻理论批评之批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42(6).
- 俞建梁,黄和斌.原型范畴理论的缺陷与不足[J].外语学刊,2008(2).
- 钱冠连.不当交际工具使用的语言——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二)[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2).
- 黄小洲.浅析伽达默尔对语言工具论的批评[J].求是学刊,2010(6).
- 黄琳,卢梓棚,马利军.汉语三字格惯用语的储存激活机制研究[J].心理学探新,2023,43(4).
- 崔希亮.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表达的困局及其对策[J].世界汉语教学,2024,38(4).
- 潘文国.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J].外语学刊,2008(2).
-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 Taylor J 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 山梨正明.認知意味論研究[M]. 東京:研究社,2013.
- 中根千枝.タテ社会の人間関係[M]. 東京:講談社,1967.
- 石黒圭.日本語は「空気」が決める 社会言語学入門[M]. 東京:光文社,2013.
- 橋本健一.語彙場の方法成分——分析と辞書記述[J].田園調布学園大学紀要,2000(3).
-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Lakoff G.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J].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1973(4).
- Geeraerts D.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Semantic Studies of Japanese from a Categorial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LI Guixi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llowing the ontological turn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linguistic inquir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n instrumental to an ontological orientation. As a central issue in both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category theory has received relatively limited attention from an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leaving certain linguistic phenomena insufficiently explained. This study proposes Category Ontology as a complementary framework to existing category theories and as a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category model. From this perspective, categories are understood not only as organizational units of linguistic form but also as manifestations of sociocultural structures encoded in language. Situated within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Japa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ormation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in Japanese. Through analyses of kinship terms and the uchi/soto distinction, it demonstrates that categories constitute linguistic realizations of Japanese sociocultural cognition, thereby providing an ontological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and cultural cognition. The proposed framework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cognitive mechanisms underlying linguistic phenomena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on among language, cognition, and culture.

Keywords: Japanese semantics; category; ontology; culture; digital humanities

(责任编辑:王晨萌)